

我如鱼，书如水，国图如海——感受近现代名人笔下的国家图书馆

□ 孟化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上有一句醒目的格言：“我如鱼，书如水，国图如海。”它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读者与国家图书馆的关系。

作为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自从业以来，我一直在图书馆讲座一线为学者和读者提供服务，在互动的过程中，会经常思考，宏大的图书馆的意义和价值落到每一位读者身上又是什么样独特的体验和认知呢？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博士论文题目为《国家图书馆与近代文化（1909—1949）》，当时试图从近代文化的视角，讨论和考察国家图书馆的地位和意义，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未能展开和深入，留有遗憾。而在博士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近代文化名家与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密切关系。他们不仅与图书馆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对图书馆做出了细致的描述和具体的评价。但目前的各种研究主要针对人物的活动，对他们书写的文字则关注较少。其实，从文字记述入手，同样能够看到文化名家与图书馆之间的深厚渊源。尤其是对于那些很少甚至从未造访过国家图书馆的人，文字也许就是他表达对于图书馆基本理解的最主要方式。这是只关注活动的研究绝对所不具备的优势。

顺着这样的思路，我确定研究的方向——近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笔下的国家图书馆。试图从这些文化名人的笔端去探寻国图的另一面，进一步呈现国图在近代文化中的丰富的、鲜活的形象。

确定了研究方向后，在对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过程中，我不断对写作的题目进行修订，最终定为“近世文化名人笔下的国家图书馆”。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得以出版。

这本小书的题目包含了三个关键词——“近世”“文化名人”“笔下”，因此要首先说明近世是多长的时间段，文化名人是什么范围，笔下又指哪些形式。

今天的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清学部图书馆是宣统元年（1909）正式成立的，所以与国家图书馆相伴随的时间段的上限是1909年，其下限按理可以一直延伸到当下，但一是因为延至当下的文化名人数量太多，不易选择；二是越近的人物越不容易把握和评述。为叙述方便起见，就只涉及一位本世纪初去世的季羡林先生，更多的则都是在二十世纪末就已经离世的名家学人。这样，本书“近世”大约指1909至1999这九十年间。

那么，这文化名人又怎么界定呢？一般来说，进入本题视野的学人基本都是以文化事业为职业的学者，有些虽然也有较高行政职务的，比如李一氓、吴晗、叶圣陶、郑振铎，但他们在历史上的影响仍以其文化成就为主，因此我也将他们归于文化名人的行列。至于名人的定义，这当然是没有明确的标准。除了声名显赫这个最普通的标志外，如果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有相关记载，或者与国家图书馆某项事件、某本书籍有关联，本书都将他算在里面。

需要说明的是，一百多年的国家图书馆馆史中，也先后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但我们这里只收录了那些曾经就职于图书馆、后来又离开了的人，比如张宗祥、向达、谢国

桢、孙楷第、贺昌群、谭其骧等，而那些一直在国家图书馆工作，直至离世或退休的人，如赵万里、张秀民等，则暂时不收在里面。甚至包括到1987年才从社科院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也因为他最终是从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的职位上去世的，所以本书也将之排除在讨论之列。大体说来，本书所讨论的是国家图书馆之外的文化名人。

“笔下”的范围很广，比较完整的一篇文章、一段文字，包括回忆文章、书信、日记以及序言、题记等等，只要其中主要针对国家图书馆而发，或比较明确地涉及国家图书馆的，便都是本书的讨论范围。但我这里仍然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论哪种形式的文字，都必须具体涉及国家图书馆的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让人可以透过这些文字看到国家图书馆的某种形象，感受到世人对它的评价。对于那些只是个别地方提及却没有具体指向的文字，则不在我的关注和考察的范围内。

综合以上三个关键词所反映的三个方面的因素，我选取了从缪荃孙、曹元忠、傅增湘到吴晗、李一氓、季羨林等40余位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分45篇，分别解读他们不同形式的文字，来了解国家图书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历以及它在学人眼中的形象地位。

为了达到比较全面准确的解读的目的，我首先坚持从文字出发的原则，尽量从文字中勾勒历史发展的轨迹，从文字中揣摩写作者的心迹，从而做到最大程度地客观公允。当然，这种客观公允又不是纯粹的文字识读——这对于我们认识国家图书馆的历史轨迹以及它呈现在文化人心目中的镜像是十分浅显的。国家图书馆既然是一个历史的社会存在，必然涉及方方面面非常深层的复杂因素，要实现对其中某个问题的全面准确认识，当然也要采取综合更多相关材料的比对，从而做出更加理性的分析判断。这时，就不仅需要跳出某条材料本身，结合更广泛的背景，还需要在跨越历史的长河中，提出一些个人的理解和评断。甚至可能还会超越国家图书馆这个独立的个体，把问题放在在图书馆事业以及文化事业等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去认识和理解。因此，我在本书特意设置了副标题——“基于相关文字的解读”，其“解读”二字就包含了各种层面的认识过程。

通过对目前所看到的这些文字的搜集和解读，我非常深刻地感觉到百年里中国文人学者出于对文化事业之关注和对书籍文献之重视。他们与不同时期的国家图书馆发生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哪怕他们未曾踏入国家图书馆一步、不曾翻阅过国家图书馆的一本书籍，但他们总以这样、那样的途径，表达了他们对图书馆里的人与物的特殊情怀。

这里面首先值得我们尊敬和永志不忘的，是那些直接向国家图书馆捐书的藏书家和为了图书馆藏书建设而呕心沥血的文人。进入本书视野的巴金、陈垣、傅增湘、贺培新、胡适、梁启超、莫伯骥、郑振铎、朱启钤等，或者在生前将自己毕生辛苦经营的藏书无私捐入国家图书馆，或者在身后由其后人将其藏书慨然允捐，极大地丰富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方便了社会公众的阅读。这种支持国家文化事业建设的热情和义举，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大力赞颂和弘扬的。我们今天把他们关心和支持国家图书馆建设的文字集中地展示出来，既是对他们既往贡献的再次纪念，也是表明图书馆事业永远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图书馆这座文化大厦，离不开社会各界一砖一瓦的支持。

学人对图书馆最实际的交往就是阅读和利用图书馆的藏书，因此作为读者，这些文化名人们出入图书馆之后，留在笔下最欢畅的文字，无疑就是他们从书中所得到的知识收获或者对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疑。曾经非常流行的“书如水，我如鱼，图书馆如海洋”的比喻，其

实是很有实在的现实依据的。如果学人离开了图书馆，则其学术发展必会受到较大影响。陈垣先生教导身边的同学，做学问要采取“竭泽而渔”的方法，这个“泽”首先当指图书馆；反过来，图书馆如果离开了学人这群“鱼”，则同样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机。我们透过这些学人的读书经历、阅读体会，不仅真切地体会了图书馆与学人之间的联系，更直观地见证了他们学术发展的一跬一步。他们的学术成长就是无数次这样的阅读过程之后逐渐实现的，把这样的阅读经历和体会整理出来，将会是非常有益的阅读教材和治学经验。而图书馆通过这些阅读实例，也将更加生动地反映自己的工作成就，为图书馆事业功碑上写上亮丽的一笔。

我们从这些文化名人与国家图书馆交往的文字记录中，更多感受到的是他们基于高尚的文化情怀而对图书馆的感激之情和友好盛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学人们对于图书馆某些工作、某些人物的抱怨和不满，有时甚至是措辞非常严厉的指责。这可能有学人自己的原因，但图书馆的不足也是不能回避的。我们应当在进一步争取学人理解的同时，更多检讨自己工作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大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类似国家图书馆这样的百年大馆，历史长，书籍多，人物杂，涉及面广，稍不留心，就会出现疏漏。因此，当我们看到学人指责图书馆的文字，不应该视其为刁难找茬，而是应把批评作为检视不足的镜鉴，促进工作的改进和发展。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在遇到这类文字上，也毫不避讳地予以收录，甚至还做了一定的解读。

我对于学人笔下关于国家图书馆的各类文字尽量做到客观公允的解读，以图努力恢复历史的印迹，但这些文字的作者均已作古，文字涉及的事件也都成为了历史。限于当时的记载和认识的不足，对于有些人物和事件的解读，可能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比如关于周作人在任伪华北教育署长时，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名义要求中国科学社将寄存于此处的书籍运回的事情，一般的解释，包括当时北平图书馆的理解，都是周作人是为日本的文化侵略创造条件，而周作人自己则在刑满释放后写的文字中，辩解称此乃为了保全古物的原状。孰是孰非，笔者一时也难以判断。我想，我要做的事情不是情绪表达，而是要尽量提供历史的真相。对于所提到的学人关于国家图书馆的文字以及其他所引用的资料，书中一般都会注明出处，以备考查。但个别实在无法准确标注其具体出处的，只好暂时付诸阙如。

当然，与国家图书馆有关的文化名人，绝不仅仅是我这一本小书所介绍的这 40 余位。本书只是限于个人学识以及目前掌握的资料，做出的一次尝试。假如大家觉得这个工作尚有意义，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项工作，搜集整理出更多的材料。

目前，从近现代名人笔下的视角来研究国家图书馆，还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我虽然投入了很多的心思和精力，并努力进行了自己的思考，但还有不足。亦希望馆中的同仁以及社会公众提出严肃的批评和指教。